

## 始料不及:9·11 如何改变了美国

张睿壮

9·11 袭击过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世界再也不会像原来一样了。难得的是,这句话总算让他说对了。9·11 改变了世界是因为它首先改变了美国——不管喜欢不喜欢,美国一打喷嚏世界就感冒已是今日世界无可争辩的现实了。那么 9·11 究竟如何改变了美国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9·11 正在把美国对内变为警察国家,对外变为世界暴君。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应当是警察国家的反义词。尽管任何对美国政治社会有深入了解又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对这一看法有所保留,但它还曾经有一定道理。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建国蓝图时最大的忧患便是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包括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作为应对措施,美国宪法的头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不厌其详地规定种种民权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政府不得通过立法或政令的方式予以剥夺或侵蚀,否则即为违宪。因此,对美国主流社会而言,美国曾是世界上公民权利最多而对国家权力限制最严的国家之一。注意这里“主流社会”的范围限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而言,他们的权利从来都得不到保证,从来都是被粗暴侵犯的,只是他们的抗议因为处于少数和/或弱势而被忽略而已。“主流社会”在美国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概念,从建国之初只包括一小撮富有的男性白人,逐步扩展到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后至少在纸面上包容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多数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自由国家”感到自豪,而把那些极权国家憎恶地称为“警察国家”。

他们万没有想到,9·11 以后警察国家的噩梦正在他们的“自由国度”内迅速变为现实。

“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也是被美国人视为最神圣的“第一修正案”,保证公民的信仰、言论和新闻自由。9·11 以后,尽管还没有法律、政令对其施加正式限制,但政府和权势集团已经通过无数的实例重新定义了“自由”的界限,使得这些公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来。

一个例子是美国之音主管惨遭革职。去年 9 月底,美国之音播出了一条有关美国即将发动对阿富汗攻击的新闻综述,其中嵌入布什总统的一段讲话录音,以及对塔利班领袖奥马尔、一位阿富汗反对派领袖和一位美国学者的采访片断。这样的新闻格式在美国新闻界本来已是常规,因为它向公众“平衡地”展现有关各方的观点,符合新闻报道公正客观的普遍规范。然而这一次美国政府不再有

假装君子的雅兴了,国务院破格干涉新闻自由,下令美国之音删去奥马尔的采访录音,尽管它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美国之音若是惟命是从也就罢了,偏偏碰到新上任不久的代理女主管米尔娜·威特沃斯是个颇有专业精神的新闻人,搬出美国之音章程上“准确、客观、全面”的新闻标准抗命,认准了新闻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死理照播不误,结果立马被炒鱿鱼,还连累了同情她立场的三名理事会成员也跟着一起下岗。此鸡一宰,群猴顿服。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节目主持人低头认错。比尔·马赫是ABC脱口秀“政治不正确”节目的主持人。顾名思义,这档节目是以离经叛道、肆无忌惮的言论为招徕的。这类节目在美国这样以言论自由相标榜的国家里本不足为奇,比比皆是,宾主在真假参半的戏谑掩护下喜笑怒骂、大放厥词,颇有些“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意思。然而大出马赫意料的是,平时的胡说八道没出问题,倒是9·11以后讲的几句真话给他惹了大祸。原来事出马赫和他的嘉宾对小布什把9·11袭击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说是为了信仰或事业拿自己的血肉之躯往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的是战士,而躲在三千英里之外用导弹不露面地杀戮“敌人”的美国兵才是懦夫。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两家大公司立即撤回对节目的赞助,ABC也受到极大压力要让他走人,这一来连平时伶牙俐齿、铁嘴钢牙的脱口秀主持人也招架不住了,只好在电视上公开道歉,低头认错,才勉强保住饭碗。

官方的异己既经整肃,私企的毒草亦遭铲除,剩下素有言论自由乐土之称的大学亦不能幸免。在历来享有宽松气氛的加州大学,一位职员在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这句大实话招致的后果是停职停薪一周,后来虽经工会帮助交涉挽回损失,“不许胡说八道”的红牌却是让大家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9·11以后发生在美国大大小小、公立私立的大学校园中的许多类似案例的一个缩影。去年十一月,保守组织“美国校董与校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捍卫文明: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的报告,列举了9·11以来大学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甚至连“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sup>①</sup>这么一句对事实的陈述也难逃“上纲”的厄运,可见清查运动之彻底。如果说美国之音的“杀戒”是开给国家公务员看的,马赫的遭遇是对所有“自由企业”雇员的警告,那么大学校园的清算则在向所有人传达一条明确的信息:在美国是没有“非美分子”可以乱说乱动的“世外桃源”的。

以上种种在不熟悉美国的中国读者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不让妄议国是、批评政府嘛?可是对美国人来说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他们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崇拜已经达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闹

① 关于美国大学中钳制言论的事例取材于薛涌:“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载 [www.pcn123.net](http://www.pcn123.net)。

得沸沸扬扬的围绕禁止焚烧国旗宪法修正案的斗争,就是一个证明。其实倒不是真有多少美国人整天想着要烧国旗,他们只是不能容忍公民的表达权利遭到蚕食:如果今天通过焚烧国旗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被禁止,那么明天就会轮到别的什么观点,这样一来自由的防线就将无法守住。因此,很多人尽管也承认焚烧国旗的方式过于邪乎,但还是坚持认为不能禁止。当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没有限制的:最高法院于1919年确立的“明确与当前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则就划出了一条界限——对国家或社会构成“明确与当前危险”的言论不受宪法保护,照大法官霍尔姆斯的解释,在拥挤的剧院中诈呼“失火!”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因为它将导致恐慌、失控和伤亡,构成了“明确与当前危险”。但除此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没有采纳其他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法理原则,可见言论自由对美国人之珍贵。在这样的背景下,9·11以后美国言论自由遭受钳制的严重性就突显出来。

令人诧异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异动居然噤若寒蝉,连一贯以捍卫自由为己任的民权组织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之类也一反常态,只是象征性地表态,没有像过去那样大造舆论或把谁拉上法庭对簿公堂。在9·11的震慑之下,美国公众异乎寻常地默认了对自己权利的侵蚀。当然,他们被侵蚀的权利还远不止于言论与新闻自由。

美国人历来对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的执法权力怀有极深的疑惧并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是最容易对公民权利构成直接威胁的权力。构成“权利法案”的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中就有5条是专为防止执法部门任意和非法搜查、拘捕、关押、起诉、审判和处罚公民的。长期以来,这些宪法条款经最高法院以大量判例做出诠释、阐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执法部门侵犯。例如,过去警方要对美国公民进行电话窃听必须先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法律程序,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使监控地区的法院相信怀疑对象涉嫌贩毒或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罪行而发出批准令才能实施,而且当监控活动超出原批准范围时还必须向有关法院重新提出申请。然而,9·11以后,这套体系正在政府的蚕食下逐步瓦解。

9·11过后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便以惊人的速度通过了新的“反恐法”并由布什签署立即生效。这部法律首先大大扩大了“恐怖主义罪行”的定义,把与美国政府任意定性为恐怖主义的国家或组织有往来(包括一般的商业往来)的人都列为涉嫌恐怖活动,对他们适用节制很少的侦控手段;其次是大大扩大了警方监听、监视怀疑对象通讯往来的权力、大大简化了进行这类监控必须经过的法律程序,特别是赋予警方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监控的权力,使警方可以轻易截获监视对象的电子邮件、查清他们使用的假名、获取他们访问过的网站名单、掌握他们网上使用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移动资金的活动,等等;警方甚至可以到电话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公司去检查怀疑对象尚未打开的声音邮件和电子邮件。在新法律下,由于“恐怖分子/组织/活动”被定义得过于宽泛,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与“恐怖”二字扯上关系(如朋友的朋友曾经与某个伊斯兰组织有过交往,而该组织现在被怀疑与另一个被怀疑为恐怖组织的组织有联系等等),而警方则可以在“反恐”的大旗下一路绿灯地对其实行全面监控。就这样,美国人一向倍加珍惜的隐私权成了9·11攻击的又一牺牲品。

就好像这样还不够厉害似的,布什于去年11月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将恐怖分子嫌犯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的法官是必须服从命令的军人,而不是终身任职的法官,因此缺乏司法独立性;军事法庭的陪审团也由军人组成,也没有平民的独立性;更严重的是军事审判的秘密性:它不允许公众旁听和媒体报道,还允许控方以保守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示证据。换句话说,控方可以对被告说我有证据证明你有罪,只是不能让你知道证据是什么。这样一来,“权利法案”中关于公民免遭非法拘捕和搜查的条款,关于审判必须迅速公正且经“正当司法程序”的条款,关于被告有权使用证人和陪审团的条款,关于嫌犯免遭过度、残酷和非常惩罚的条款,就全都名存实亡了。美国历史上动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的先例仅在内战和二战时有过,在和平期间是绝无仅有,但布什政府一口咬定反恐是一场全球性战争,美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因此适用战时紧急状态法令。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布什今年年初提出的“恐怖活动情报与防范系统”(TIPS)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在公共交通、公路运输、海事水运、邮政和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和电话)等行业中招募志愿告密者,将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可疑情况及时报告给一个全国举报中心。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计划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问题就出在最后两个行业上面。其实类似的举报网在前几个行业早就存在,之所以没有引起反对是因为这些行业的职工工作和监视的场所都是公共场所(如街道、公路、近海等);可是邮政和公用事业就不同了,它们的职工在工作时都有进入居民家中的机会,这就意味着每家的隐私都随时有可能被报告给当局。又一个美国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家——遭到了政府的威胁。这一次美国公众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权组织把它与在西方世界臭名昭著的前东德秘密警察 STASI 相比,极端保守的《华盛顿时报》也惊呼它引起了公众对美国沦为奥威尔名著《1984》中极权国家的恐惧,乔治亚州众议员辛迪亚·麦金尼在国会发言的题目质问“是反恐战争还是警察国家”?连布什自己的共和党的众院多数派领袖理查德·阿梅都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在美国政治上从左到右的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下,美国政府最近不得不做出让步,把邮政和公用事业从该计划排除在外,以确保美国人的家庭隐私不受侵犯。美国公众似乎在保护民权的斗争中又扳回了一个回合。然而细想一下,今日之美国究竟还剩下多少民权可以被保护呢?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喜欢与人开玩笑,本想去这间屋子的人结果却发现自己进到了那间屋子。9·11袭击者本来的目标无非是以制造恐怖为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这个目标现在看来是失败了,恐怖攻击未能改变美

国的政策,倒把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恐怖分子在这次攻击中对伤害美国的期望无非是有限的建筑毁坏和人员伤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恐惧,结果除此之外还导致了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的惨重伤亡,这大概是恐怖分子始料不及的吧。

如果说9·11正在国内把美国变成警察国家,那么它同时也正在国际上把美国变成世界暴君。9·11以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反恐攻势。本来美国以受害者的身份去讨公道,以世界最强国的地位去维持世界秩序,是满可以占领道德高地而大兴正义之师、博得世界各国的拥护和支持的。然而由于美国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独断独行、肆意妄为,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全不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放在眼里,反而把别国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视若草芥、随意摧残,还假借反恐之名行一己之私,企图趁机在全球铲除异己并实现其地缘战略部署,再加上美国的反恐攻势从一开始就存在法理上和程序上的严重缺陷,从而完全瓦解了这场攻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使之成为美国从霸权向暴政迈出的一大步。

“霸权”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是个贬义词,在西文语境里却常作为中性词使用,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和影响。在这种意义上,霸权甚至可以是“良性”的,意思是霸权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并实行具有一定“正当性”(legitimacy)的秩序,在本来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世界领袖”甚至“准政府”的角色。这种秩序的“正当性”一般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public good),诸如和平、安全、自由贸易、环境保护等等;二是决策过程的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特征,即在国际事务中尽量通过谈判和说服达成共识,而不是将霸权国家的意志强加于人作为解决分歧的常规方式;三是法规与执法的公平性,表现为国际法规对各国平等适用及其强制执行必须经由“正当程序”等等。正当性较强的霸权秩序和霸主权威比较易于为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霸权体系也较为和平稳定。美国与其西欧盟国及日本所构成的西方世界大致就是这样一种体系。

在冷战的“旧日好时光”里,由于存在着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制约,美国在大部分处于其影响控制之下的第三世界中的霸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带有某些“良性”特征,尽管在程度上要远低于西方世界,例如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所提供了自由贸易、货币流通、金融信贷和发展援助等经济公益,又通过针对体系外的军事保护伞和在体系内行使警察职能提供了稳定与秩序等安全公益。与此同时,美国在第三世界的霸权体系还带有不少“恶性”特征,例如它作为该体系的“老大”常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肆意侵犯它们的主权,甚至不惜通过暗中破坏或武力入侵的方式在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颠覆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政府、扶植亲美的军人独裁政权。这就决定了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霸权既有反抗斗争的一面,也有接受服从的另一面。讽刺的是,当时世界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霸权虽无“良性”可言,但其存在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美国

的有效制约,是使美国霸权“良性”化的关键因素。

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带着它一度对美国构成的制约一起消失了,美国从此一家独大,可以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提升,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日益削弱;随着美国霸权的覆盖范围向全世界扩展,其性质也在迅速“恶性”化。没有了苏联的竞争,美国不再热衷于向世界提供“公益”,反而可以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牺牲诸如军备控制、打击犯罪、环境保护、自由贸易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如美国撕毁反导条约、退出国际刑事法庭、取消京都协定、对钢铁等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亚洲金融危机先是袖手旁观而后又在援助时附加苛刻条件等等,就都是具体事例。此外,美国国际发展援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态度愈来愈消极,其实质可以概括为:要美国出钱出力就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为美国利益服务,不然美国就什么也不给,连会费都不付,甚至干脆撤出了事。

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外干涉的选择性,在无利可图时放弃作为霸权国家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对发生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巴勒斯坦等地的种族清洗罪行无动于衷,或是直至太迟才有所动作,或是至今还在纵容助长犯罪。反过来,当美国认为符合本国利益或意识形态的需要时,它可以全然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去进行那些完全没有任何国际法理正当性的海外干涉,如它在巴拿马、海地、科索沃以及伊拉克(1991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如今,多边主义于美国外交已成昨日黄花,最后通牒式的号令已取代协商谈判成为美国外交的常规,最近的例子就是布什在反恐之初对世界各国的警告——“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除了实力地位是首要决定因素外,美国霸权性质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外交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主张强硬路线的新保守主义得势,遂使美国霸权呈现种种“恶性”症状,如到处支持搞恐怖活动的“自由战士”(包括本·拉登等)、无视国际法庭对美国在尼加拉瓜犯罪的裁决、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但受当时实力地位的制约(两极均势而非单极独霸),美国还不能完全无法无天。及至冷战结束,尽管克林顿政府信奉的自由主义在原则上主张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但毕竟形势比人强,美国单极独霸的实力地位还是使美国霸权走上了“恶性”化的道路,例如在对海地和科索沃的入侵中美国就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一意孤行。到了小布什上台后,保守派控制了政府,强硬路线大行其道,美国霸权开始了全面而急剧的“恶性”化,而9·11后的反恐攻势则使美国霸权秩序的正当性消失殆尽。

美国反恐攻势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首先出在对打击对象的界定上。反恐攻势的打击对象自然是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然而谁是恐怖分子?奇怪的是,尽管联合国已经通过了数以十计的谴责、制裁恐怖主义的决议、公约,它却迄今为止未能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倒不是因为这个定义真有这么难下,而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坚决不让达成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阻

挠者不是别人,正是以反恐领袖自居的美国。多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不断提议要对“恐怖主义”制定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明确的定义,以使国际反恐法规和行动有一个统一不变的尺度而确保公正。然而这些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美国及其少数追随者的反对而未果。美国担心,一旦有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美国及其盟友的所作所为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活动,而他们自己就成了恐怖分子。反之,如果不存在这一标准,那么美国就可凭借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传媒、舆论等方面的压倒优势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那样,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好恶把一些人定性为“恐怖分子”,而把另一些人称作“自由战士”,尽管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相似。

问题的症结在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为了正当的目的能不能不择手段?正当的目的能否使恐怖手段正当化?对这一问题美国采用了双重标准:只要目的是它支持的事业,答案就是肯定的,反之则不然。例如,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一大批伊斯兰圣战组织,过去在阿富汗同苏军及亲苏政权作战时,美国把它们奉为“自由战士”,给予大量武器弹药和后勤支援,还为它们提供恐怖活动的训练和器材;但是到冷战结束后,当这些组织把斗争矛头转向美国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时,便立刻成了“恐怖组织”和美国清剿的对象。又如在过去40年中,美国处心积虑想要推翻古巴的“极权”政权,豢养、资助、装备并训练了大批古巴“自由战士”对古巴进行常年不断的破坏、骚扰,包括劫持飞机和船只、暗杀和绑架、对民用特别是旅游设施纵火和制造爆炸,以及对农作物和牲畜投毒等典型的恐怖活动。可是对于从萨尔瓦多到危地马拉到哥伦比亚等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游击队,美国却一律定性为“恐怖分子”,不惜伙同那些国家中比“恐怖分子”还残暴百倍的亲美右翼政权进行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出于同样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煽动并支持经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科索沃民族解放军”和车臣叛军进行“争取民族自决”的恐怖叛乱活动,另一方面却支持它的盟友英国和西班牙分别对争取独立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分离组织进行残酷镇压。然而,反差最强烈的莫过于美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区别对待。如果有任何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的话,那么没有什么目的能比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更正义的了。他们的土地被强占、家园被摧毁、自由被剥夺、人民遭屠杀,他们有一切理由去反抗、去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可是美国主宰下的西方传媒却把“恐怖分子”这顶帽子牢牢地扣在巴勒斯坦人的头上,把受害者变成了罪犯。

反过来,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所有恐怖活动的始作俑者,也是最严重的恐怖罪行的制造者。从上世纪4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使用恐怖手段打击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首开了使用信件炸弹暗杀官员和在闹市制造强力爆炸杀伤众多平民的先例。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当时是一个主要恐怖组织的领袖,他曾直言不讳地著文宣称“没有任何道德准则不允许把恐怖作为战争手段”。以色列建国后又对阿拉伯邻国进行了一系列首开先例的恐怖袭击,包括

劫持和击落民航飞机、绑架人质、使用邮包炸弹和汽车炸弹等等。现任总理沙龙在1982年一手策划的沙巴难民营大屠杀(3500人遇害)和以色列及美、英情报机关共同制造的1985年贝鲁特市场大爆炸(300余人伤亡)都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案例。近年来,以色列更是有恃无恐地对巴勒斯坦进行恐怖攻击,用导弹屠杀无辜平民,用推土机夷平民居,用昔日德、日法西斯占领军惯用的“连保连坐”的野蛮方法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家人、邻居和同事进行报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政府行为,比之后者的个人行为更令人发指、更不可容忍;前者是藉先进强大的军事机器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比起人体炸弹式的原始恐怖主义来杀人更多、效率更高。然而正是对于这么一个甚至不屑遮掩自己的恐怖主义罪行的国家,美国却倾全力相助。离开了美国在道义和外交上的坚决支持和每年40亿美元的军、经援助,以色列的所有这些暴行是难以为继的。

美国与恐怖主义的瓜葛并不止于上述种种对恐怖活动的支持,它本身的国家恐怖主义记录比起其盟友来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就是三年前美国率领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简言之,美国为了迫使南政府接受强加于它的科索沃危机解决方案,不惜对包括电厂、水厂、铁道、公路、桥梁、电台、电视台、学校、医院、居民住宅区在内的民用目标进行了事先预谋的狂轰滥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尤为恶劣的是美国还大量使用了专为增加对平民杀伤力的贫铀弹和子母弹。美国的目标无非是通过轰炸在南联盟公众中制造恐怖以对南政府进行讹诈,从而迫使其屈服。尽管在国际上坚决反对对恐怖主义下定义,美国政府在本国内却对恐怖主义有明确的界定:“恐怖主义是指为制造恐怖而有预谋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目的在于恐吓或胁迫政府或社会以实现某种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企图。”如果把美国在南联盟的所作所为与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作一对比,其相符的程度令人吃惊。当然,有着双重标准的法宝,美国一贯正确的地位不会有丝毫动摇。

如果说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是美国反恐攻势在法理上的漏洞,那么不经审判即行定罪和惩罚就是对“正当程序”的破坏。有什么证据能证明9·11的元凶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美国通告天下:“我们有证据,但不能让你们知道。”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高度疑虑。不仅如此,美国在反恐行动中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行刑队的职能于一身,完全破坏了对司法公正至关重要的分权制约原则,再次削弱了反恐攻势的正当性。如果世界上谁是恐怖分子、哪个是恐怖组织或国家、该对它们进行什么样的惩罚等等都由美国一家“钦定”,那么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权利和安全可言?眼下,正当美国紧锣密鼓地策划把“反恐”战争扩大到其他所谓的“无赖国家”——从伊拉克开始——之际,这种担忧已从纸面上的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除了法理和程序上的弊端,美国在阿富汗“执法”时滥捕滥杀的行为也早已超过了自卫的正当界限,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反恐攻势的正当性。同轰炸南联盟

时一样,为了把美国军人的伤亡减至最小,美国空军不惜以阿富汗平民的生命为代价从高空以巨型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大量不必要的平民伤亡;美国地面部队把送病人去医院的车队或举行婚礼的村庄当成“敌人”加以歼灭的“事故”也时有发生,而且事后既不认错,更不道歉;至于美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剥夺战俘的一切权利甚至虐杀战俘,美国居然以“不承认其战俘身份”的狡辩去搪塞国际舆论的关注。通过这一切美国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它的傲慢与偏见:生命和权利之可贵是对美国人而言的,至于对别人,那是可以视若草芥的。

一年前,当9·11袭击的硝烟还未退尽,世界各国就纷纷对美国的损失表示同情、对美国的反恐表示支持。曾几何时,当它扯着反恐的虎皮把战火烧向伊拉克时,美国环顾全球之下,发现在略有一点影响的国家中除了它的小伙伴英国外竟找不到第二个支持者。呜呼,当初一呼百应的反恐领袖如今成了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两相对照,今日美国失道寡助的困境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